



我系统提高了政治觉悟，深刻领会并决心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。通过整风学习，进一步统一了思想，坚定了革命意志。

1944年12月，我随军渡江南下，抵达浙江长兴。次年1月，天寒地冻，我参加了在浙西山区举行的苏浙军区成立大会。随即被分配到地方，与同志们一道，在复杂险恶的天目山地区开展游击斗争，发动群众，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，努力扩大解放区。当地敌我拉锯，群众基础复杂，我们常常一夜要转移数次驻地。残酷的环境下，与我一起工作的两位战友，就是在发动群众时不幸遭敌密报，惨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，永远倒在了天目山的薄雾里。听到

噩耗那天，山风冷得像刀子……这笔血债，我们记下了，也更明白斗争的残酷。

1945年初，国民党军不顾民族大义，悍然发动三次进攻，妄图将我军挤出江南。我们被迫自卫反击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，共俘虏敌军师长以下官兵6000多人，粉碎了其阴谋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投降。消息传来，群情振奋。然而，蒋介石却命令敌伪拒绝向我军缴械，并强令我军北撤。为顾全大局，避免内战，党中央决定北撤。1945年10月，我带着抗战胜利的喜悦与对牺牲战友的深切缅怀，随军撤至苏中，调入新四军一纵队后勤部，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。■

穿透硝烟的号角

1945年3月，在一场激烈的反扑战中，我的右腿不幸被子弹击中。

□ 口述 | 陆志其

1940年7月，新四军东进启海，点燃了敌后抗日的烽火。两年后的春天，部队来到我的家乡启东三鲍镇。

宣传抗日救国的号角，深深打动了食不果腹的穷苦少年。年仅11岁的我，怀着最朴素的愿望——吃饱饭、打鬼子，报名参了军。

入伍不久，我被分配到新四军的一个军工所，任务是修复枪炮、制造弹药。1944年春，我调至苏北九分区东南警卫团，担任警卫员，并肩负起一项全新的使命——成为司号兵。司号员的训练之苦，远超想象。每日需提前一小时起身，集合操练后，还要徒步几里到空旷野地练号。要求极其严格，训练中甚至不准解手——后来才明白，这是为了练就支撑长音的那股“丹田之气”。半年汗水浸透，我终于熟练掌握了五个基本音阶，能精准

吹奏生活号、勤务号，以及决定战场胜负的——战斗号谱。从此，我紧跟在首长身边，他的每一个指令，都化作我唇边迸发的号音。

战场上，那支铜号便是我最锋利的武器。每当冲锋号撕裂弥漫的硝烟，嘹亮地刺破长空，仿佛胜利的宣言提前奏响。那排山倒海的气势，足以令日伪军魂飞魄散，仓皇溃退。这穿透灵魂的号声，早已在侵略者心中烙下不可战胜的恐怖烙印，他们无从判断虚实，往往只能丢盔弃甲或举手投降。号音，是战士冲锋的战鼓，更是敌人耳中的丧钟。

枪林弹雨中穿梭，我的腿、手、头部多次挂彩。1945年3月，在一场激烈的反扑战中，我的右腿不幸被子弹击中。直至同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我才得以返回启东老家休养。■